

# 我们无处安放的农田 ——空间生产全球化格局下我国耕地资源侵占问题研究

Nowhere to Place Our Field: Study on the Invasion About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Dur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Space Production Era

肖竞 曹珂  
Xiao Jing, Cao Ke

**摘要：**本文以我国城市化进程为背景，结合经济学相关原理，分析了全球流动资本在不断注入空间生产寻找再生躯壳的过程中，如何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的需求及地方政府对耕地“农转非”巨额增值收益的渴望相结合，共同形成耕地侵占现象幕后推手的问题根源；并从市场运行的微观层面与国家调控的宏观层面，分别探讨了土地“入市”与生产性支出等关键问题的抉择对我国未来耕地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试图穿透现代化的迷雾，回归土地问题的本质，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条值得借鉴的线索。

**Abstract:** Based on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and combined with related economic principles,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global working capital combines with the demand of the release of rural surplus labor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desire for the huge proliferation of land transfer; and these three together push invading the cultivated land of China. From the micro-level of market running and macro-level of state regul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uture influence of land transfer and productive expenditure; it also tries to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land issues and provide a worthy clue for further researches.

**关键词：**空间生产全球化；资本与劳动力过剩；  
生产性支出；土地流转；城市企业化

**Keywords:** Globalization of Space Production;  
Surplus of Capital and Labor;  
Productive Expenditure; Land Transfer;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 1 序幕拉开，在“希望”的田野上——全球空间生产与中国城市化

事物的转变将在某个关键的时间与地点发生。从发生转变的这个时空开始，现代性在各个领域所积聚起来的力量将发散出去，吞没整个世界<sup>[1]</sup>。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 1.1 酣梦中熟睡的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空间利润的冻结

计划经济时代，出于支持工业化与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战略考虑<sup>①</sup>，我国一直对农产品施行低价收购政策，导致粮食价格长期低于应有价值水平<sup>[4]</sup>，造成土地用作粮食生产与其他使用方式的利润回报之间存在巨大差额。但在特殊的政治经济逻辑下，这种利润差被冻结起来，尚处于潜伏期，一切均在国家的调配下按部就班地进行：农民当着正午的烈日流下锄禾的汗水，工人随着车间的齿轮转动自己的人生，城市如初生的婴儿在酣梦中熟睡……相隔几百米的近郊农户与城镇居民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从未想过彼此生活的空间与脚下的土地有着怎样的变数与交集。

### 1.2 现代化开启的空间——改革开放后土地价值的释放

当时代发展的引擎进入市场轨道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空间不再是外在场所，而是事物自身的属性。空间财产化，空间就是金钱，城市空间与土地获得了新的本质。现代性空间中的灵魂

作者：肖竞，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ck8109@126.com  
曹珂，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ck566@tom.com

①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社会主义农业对工业的一定的支援，是国家积累的一种形式”<sup>[2]</sup>；“19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工业化积累的外部资金来源完全断绝，迫使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就必须将工业化完全建立在内部的积累上。此时，中国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来源只能是中国最大的传统产业——农业。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是当时中国孤立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的唯一选择。”<sup>[3]</sup>

是资本，它构成特定时空下社会转变的驱动力量。”<sup>[1]98</sup> 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土地中潜藏的巨大经济价值被城市化过程释放出来<sup>①</sup>。

### 1.3 “翻田覆地”的力量——全球流动资本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力的结合

快速城市化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拥有以及经营。而同时，它们也“被资本与分配的意志所垂涎”<sup>[1]97</sup>：全球资本积累、积聚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剩余如恶灵般四处寻找着使之得以再生的躯壳。另一方面，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样需要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来消化。两者在中国巨大的空间与市场找到了结合点。于是，随着流动资本“像空气般涌入”，全球性的空间生产伴随地区性的城市化进程在华夏大地上逐渐拉开了帷幕。一只以全球为尺度的无形之手，开始重新拼贴这块 960 万 km<sup>2</sup> 的土地。从那一刻起，我们曾耕种千年的农田，注定无处安放。

## 2 社会主义的耕地也是有限的——经济繁荣背后的粮食安全危机

(现代) 社会普遍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sup>[1]47</sup>。

——乔治·尤金·奥斯曼 (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

如马克思与奥斯曼所见，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人们总会“基于自身的私人动机而牺牲所属阶级的一般利益”。因此，当中国进入“白猫黑猫时代”后，个体中心的利己思维自然伴随市场经济的主导风向全面压制共产共生的社会理想。“人民”、“集体”、“国家”（无论这些词汇真正指的是谁）这些过去中国人曾无偿奉献的概念指向逐渐转换了位置，成为当下个体为满足私欲而疯狂索取的目标。

于是，在这个幅员巨大的国家中，“18 亿亩”<sup>②</sup> 这个庞大到让人没有尺度感的规模<sup>③</sup> 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已虚无到不能激起任何个人情感涟漪的概念，似乎给了所有意图从

事土地经济与空间生产的人们一种“国家耕地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暧昧暗示。

然而，当我们把所有难以在个体思维中清晰成像的相关数据汇总、显影之后，所得到的图景，则让整日盘算着靠土地生财的人们不再有自欺欺人的借口：社会主义的耕地也是有限的！

### 2.1 五谷丰登的极限——耕地逐年减少的现实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的粮食单位产量逐年攀升。但在亩产增长的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耕地资源却在急剧减少<sup>④</sup>（图 1），全国粮食生产总量也随之呈现增长减缓的趋势<sup>⑤</sup>。

由此可见，年年丰收的繁荣背后实则是耕地日趋减少的现实隐忧。伴随着土地这一根本性资源的流失，为不断增长中的十数亿人背负着口腹之任的中华大地日趋疲惫，即将达到五谷丰登的极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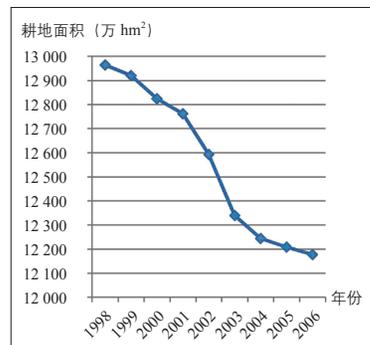


图 1 1998 至 2006 年全国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各年国土资源公报

### 2.2 农业生产的瓶颈——耕地日渐破碎的趋势

总量减少的同时，随着各种经济活动在农耕区的细密化，在土地流转、转用、复垦的过程中，我国的耕地还呈现出日渐破碎的趋势（斑块数增加、斑块面积减少、分布趋向分散）<sup>⑥</sup>（图 2）。

① “1998 年的住房分配货币化（加之户籍放宽、土地使用权出让、中央地方分税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景观，释放出了几十年积累的‘库存’，导致全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然而，这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向我们暗示了制度进步释放出来的巨大隐形财富。”<sup>[5]</sup>

② 2006 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18 亿亩耕地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

③ 即 120 万 km<sup>2</sup>，相当于英伦三岛国土面积总和（24.5 万 km<sup>2</sup>）的 5 倍多。

④ 1998—2006 年，我国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自然灾害毁损的总耕地达 1 119.46 万 hm<sup>2</sup>，虽然同期开发复垦增加耕地 328.81 万 hm<sup>2</sup>，但增减相抵，耕地净减少 790.65 万 hm<sup>2</sup>，年均净减少 87.85 万 hm<sup>2</sup>（相关数据根据国土资源部各年国土资源公报整理）。并且，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我国实际的耕地面积减少量远大于统计数据<sup>[6]</sup>。

⑤ 1996—2007 年，我国单位粮食产量从 4 894 kg/hm<sup>2</sup> 增加到 5 320 kg/hm<sup>2</sup>，年均增长 7.9%；而同期的粮食总产量却只从 4.51 亿吨增加到 4.56 亿吨，年均增长率仅 1%，为单位产量增速的 1/8。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⑥ 例如，在对昆山土地利用情况的综合分析中，研究发现 1987—2000 年间，昆山市水田斑块数量增加了一倍，并且最小斑块面积由 1.36 hm<sup>2</sup> 缩减到 0.36 hm<sup>2</sup>。此外，西安、辽南、深圳等地近年来也出现耕地破碎情况<sup>[7-10]</sup>。

耕地的破碎化使其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单位面积的生产效率；同时，也阻碍了农业从小农经济向规模化经营的升级，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瓶颈。

### 2.3 粮食安全的临界——耕地持续极化的■忧

面对耕地缩减、破碎的现实，国家出台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sup>①</sup>，对耕地资源进行保护。

但在“总量控制”与“动态平衡”的原则下，地区间耕地资源分异、极化的问题却日益突出<sup>②</sup>（图3）。部分地区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致使相关区域内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甚至突破需求的临界值<sup>③</sup>，需要通过异地输调与购买才能满足本地粮食供应。

综上所述，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在利益的驱动下，“蚂蚁搬家”化的市场行为，使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管制难以奏效，在巨大的时空范围中，难免存在有意无意的制度漏洞与人为疏忽，致使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破碎、极化，造成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粮食安全的隐忧。

## 3 谁在拼贴我们的土地——耕地侵占、流转问题探源

虽然，在市场经济中，个体的利己行为直接导致了各地土地侵占的事实，但本文以下的分析将证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capital flows）与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及其

所造成的地区经济差异与城市企业化分工才是这一历史过程真正的始作俑者。

### 3.1 无形之手盗走了“人民”的农田——市场空间竞价引发耕地侵占转用

空间首先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出现的。空间之所以得以生产，就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图谋。在特定的资本主义逻辑下，房地产的租金与价格将逐渐发挥土地使用配置的功能，将土地利用方式与空间竞价结合起来，使资本流通释放到重建既有环境与空间排列的任务中<sup>[11]133, 136</sup>。

——大卫·哈维

空间生产首先改变了不同土地使用方式的空间投资密度，进而造成巨大的利润差额，使资本在土地市场中因追逐利润的天性，毫不迟疑地舍弃农业生产而转向地产开发。

马克思有句名言：“100%的利润足以使人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然而，在过去近十年我国各地“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用地被征为国有，变成非农用地的过程中，土地资本可几倍乃至十几倍地增值。”<sup>[12]442</sup>可观的收益足以让“使人践踏法律”的概率达到100%。

此外，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即使农地自身绝对位置不发生改变，其空间价值仍会随着与城市相对距离的缩短而不断增加<sup>④</sup>。与几乎没有变化的农业生产利润<sup>⑤</sup>相比，空间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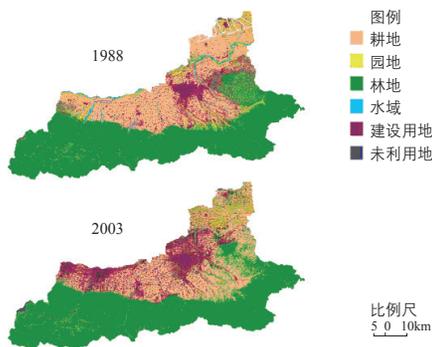


图2 西安地区耕地变化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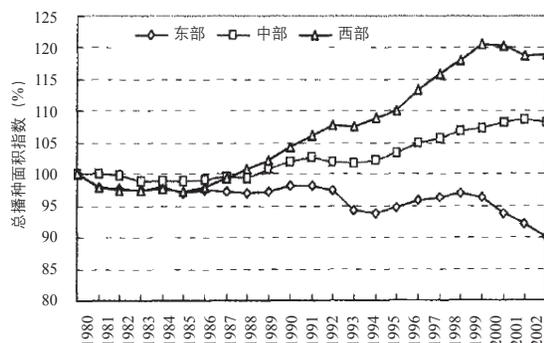


图3 1980—2002年东中西部农业播种面积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

① 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② 从区域范围来看，在辽宁南部地区，受地理与经济因素影响，大连东南沿海地区、营口西部平原地区耕地较多；而渤海湾沿海地带由于城镇建设和工矿用地的扩展，耕地侵占严重<sup>[8]</sup>。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受资源与气候条件的影响，我国耕地的重心正逐渐向北方移动；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变化来看，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耕种区域则呈现东西分异的现象<sup>[11]</sup>。

③ 据统计，我国已经有1/3的省人均土地面积小于1亩，1/3的县人均土地面积小于0.8亩；这个数据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线。亦即在我国1/3的地方，人地比例关系已经使土地连维持农民自身的生存也不足了。<sup>[12]149</sup>

④ 在城市土地市场中，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价高者得”是一个基本的分配原则。土地的所有者会把土地给出价最高的业主使用。各种使用者的市场租金梯度线构成了城市的土地价格曲线。使用者由于生活通勤成本与生产运输成本均随着距工作与市场中心距离的缩短而下降，所能支付的土地租金便相应上升。因此，土地价值便随着与城市相对距离的缩短而不断增加。<sup>[13]304-310</sup>

⑤ 由于农业单位面积上的收益远远低于城市用地。因此，在杜能环理论中因区位变化影响农业收益的交通运输成本在此对农业用地生产利润的影响被忽略掉。在竞租价格曲线中，区位对其影响也相当平缓，理论分析常常把其近似划作一条水平直线。<sup>[13]189-192</sup>

所带来的利润可达到小农经济生产利润理论值的千倍、万倍<sup>①</sup>（表1）。更何况,在实际生产中,“农民纯粹在农业生产领域中,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投入产出为负”<sup>[12]234</sup>。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地零星的土地转用,成为了历史的一种必然。

但另一方面,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理论上,种粮的绝对利润率并不比地产开发低。那么,在利润率几乎相同的情况下,单位面积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为何会产生如此悬殊的利润差额?其所造成的强大土地转用动力又究竟缘何而来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市场是以成本为价格基础的。在小农经济中,将一亩地用作粮食生产,投入通常在千元左右;而用作地产经营,投资动辄数十万,为前者的数百倍。从经营者的角度而言,即使两者利润率相同,用土地种粮也意味着无端被剥夺了数十百万的投资机会,使资本闲置,不能转化为利润。这在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中是不可忍受的。

其次,土地经营在本质上是对土地使用权的经营。经营过程中资本投入产出的周期决定了利润回报的效率。在粮食生产中,自然规律决定了土地一年一用,即其“折现率”<sup>②</sup>为1;而在地产项目中,折现率却可达到10倍以上<sup>③</sup>。因此,土地开发所获收益九成以上实为一种变相的虚假利润(false profit),来自购买者对土地未来使用权预付价格折现后的一次性支付。换言之,与农业经营相比,其瞬时利润(instantaneous profit)被放大了十倍之多。而这对于追逐资本产出效率的经营者而言,是非常乐意看到的。

综上所述,随着城乡相对时空距离的不断改变,各地农地不同利用方式的利润势差与三峡大坝的水位同步上涨。基本农田的约束,终究敌不过市场日益强大的利益驱使。一切如哈维所预见: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体制下,房地产轻易地以空间竞价方式取得了土地配置的主导权。因此,真正造成我国耕地侵占、转用的危机根源,是资本那“一旦启动,便很难再停下的增长逻辑。”<sup>[1]12</sup>

### 3.2 有形之手撕扯着大地的伤口——政府宏观调控导致市场修复失效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进入现代化都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sup>[12]438</sup>。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

空间生产造成的另一深刻变革即其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使政府对市场宏观调控的准确度与客观性受到严重干扰。

从2000年安徽试点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农村“土地所承担的生存功能,已(逐渐)重于生产功能。”那么,“土地既然成为社会保障的基础,就很难再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sup>[12]48</sup>但各级政府却在深谙此理的情况下,由于“不能有效抑制在财政严重亏损压力下,对耕地‘农转

表1 西南地区中小城市近郊土地开发与粮食生产利润差异综合分析

单位:倍

不同情况	地区	土地一级市场 / 粮食市场				土地一级市场 / 粮食市场				土地市场 / 粮食市场			
		成本	收益	利润	利润率	成本	收益	利润	利润率	成本	收益	利润	利润率
现实情况	宜宾	276	619	-318	-1.15	2 851	6 356	-3 215	-1.13	3 127	6 974	-3 533	-1.13
	云阳	213	389	-50	-0.24	2 290	4 222	-607	-0.27	2 504	4 611	-657	-0.26
	南江	357	545	-148	-0.41	2 578	4 857	-3 557	-1.38	2 935	5 402	-3 705	-1.26
投入理想状态	宜宾	127	565	4 069	32.00	3 827	6 356	26 587	6.95	3 954	6 921	30 665	7.75
	云阳	192	370	11 976	62.42	3 210	4 222	70 034	21.82	3 402	4 593	82 010	24.11
	南江	291	495	2 665	9.15	3 195	4 857	22 592	7.07	3 486	5 352	25 257	7.25
产出理想状态	宜宾	276	455	3 221	11.69	3 240	4 299	20 647	6.37	3 515	4 754	23 869	6.79
	云阳	213	269	1 811	8.48	3 014	3 216	8 787	2.92	3 227	3 486	10 598	3.28
	南江	357	330	278	0.78	3 792	3 401	2 667	0.70	4 149	3 731	2 944	0.71
完全理想状态	宜宾	127	455	823	6.48	4 349	4 299	4 243	0.98	4 476	4 754	5 066	1.13
	云阳	192	269	372	1.94	4 223	3 216	1 881	0.45	4 415	3 486	2 253	0.51
	南江	291	330	359	1.23	4 698	3 401	2 402	0.51	4 989	3 731	2 761	0.55

悬殊的成本投入

巨大的利润空间

相差无几的绝对利润率

注:土地市场=土地一级市场+土地二级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 ① 通过对西部几座中小城市的调研,笔者发现在实际生产中,将一亩地用作粮食生产,通常产出价值在千元左右,扣除生产成本,即使加上国家补贴,利润也仅在百元徘徊。而随着城市规模的差异,城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土地拍卖价格可达到千万、百万、十万元不等,扣除成本,其利润仍旧维持在同一量级水平,达到单位面积农地利润的数千倍至数万倍。
- ② 即土地经营者所拥有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年限与其通过各种生产方式完成对使用权年限内土地利用的生产周期的比值。
- ③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土地开发使用权年限通常为40、50或70年,其开发周期一般为3~5年,则折现率通常可达到8~25倍。

非’巨额增值收益的渴求”，不断默许（甚至主动征用）农村土地进入市场<sup>①</sup>，完成地方财政原始积累的目的<sup>②</sup>，使政策调控从出发点上便已丧失了公正<sup>③</sup>的前提。

另一方面，即使农地进入市场，地产开发与粮食生产存在巨大利润势差，市场同样也有自我调节、修复的能力：根据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低投资回报产业部门中的资本与生产要素会自发向高利润的生产部门流动，直至部门间的利润在价格调整与供求关系的影响下趋近平衡，形成平均利润。根据这一机制，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资本进入市场的初期，由利润落差导致的农地转用是符合市场客观规律的正常现象。在随后的变化中，土地利用方式应随着市场的调节逐渐趋于平衡状态<sup>④</sup>。但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受各种现实情况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市场自我调节的恢复机能却发生了紊乱（图4）：

农业市场中，由于粮食生产效率提高、异地农产品贸易以及粮食库存保证了短期内市场供给量的相对稳定，使区域

宏观耕地总量减少的客观事实粮食市场中无法即时得到相应的价格表现<sup>⑤</sup>。

而在地产市场中，国家不断通过“生产性支出”（productive expenditure）<sup>⑥</sup>驱动城市化进程，使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sup>⑦</sup>，大众住房的需求始终无法随市场供应的增加而减少，进而造成地产及相关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居高不下。同时，我国商品房购买制度<sup>⑧</sup>也使政府“生产性支出”产生的城市外部效应对建成居住区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通过物业税收的形式进行调节。于是，随着既有商品房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用地周边设施建设与环境改善等正向外部效应持续增值，“在这个充满价差的世界，所有社会团体都逐渐（开始）从事地产买卖的投机活动”<sup>[1]121,124</sup>，城市住房金融产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进一步扭曲了市场的供求关系<sup>⑨</sup>。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持续进行，耕地不断向其他高回报的土地利用方式流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土地出让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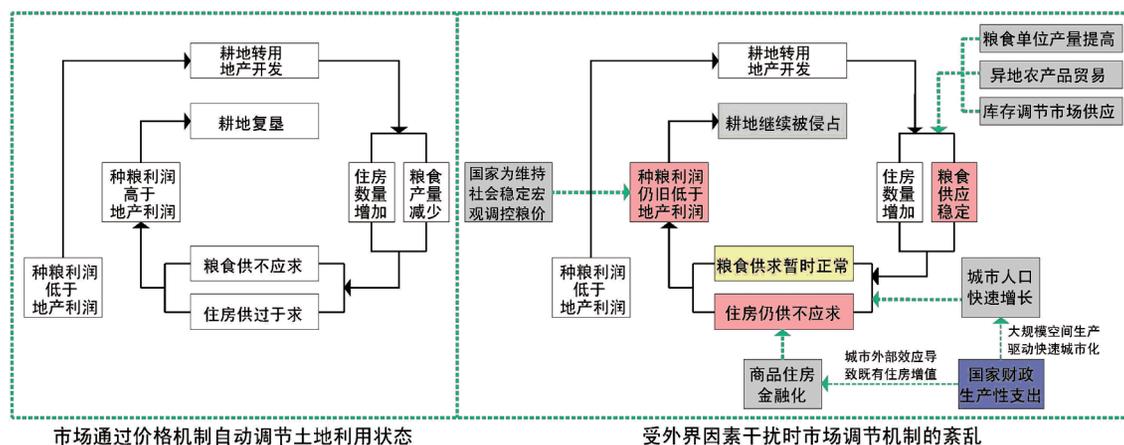


图4 现实环境下政策调控对市场平均利润机制的干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① 最直接的表现即：在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规划编制中，政府并不是因为有多少实际的城市人口增长而相应地安排土地；而为了卖出多少土地而编造相应的人口与城市化率指标。
- ② “从调查情况看，有些县级地方财政收入的20%~30%来自于土地出让收益。有些典型镇政府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sup>[12]437,440</sup>
- ③ 主要是代际公平。
- ④ 所谓平衡状态，并不一定指种粮与地产开发在同一块土地上能够产出同样的利润回报（这是不现实的）。前文分析中已指出，现行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利润率实际相差无几，只是由于投资密度与回报效率的悬殊才导致经营者在选择上对后者的偏好。因此，只要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能够在机制作用下持续提高，与空间生产相比有一定的竞争力，即使绝对利润仍比后者低，也能形成一种经营者对土地利用的考虑逐渐转向的态势。因此，所谓的平均利润机制的作用应理解为一种趋势的转向，即度的问题，而非量的绝对平均。
- ⑤ 虽然，从近年情况来看，粮食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基价过低，粮价缓慢持续增长仍无法刺痛大众在追逐金钱的高强度紧张状态中早已麻木的神经（直至近两年农产品价格井喷式的暴涨，才引起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 ⑥ “所谓国家生产性支出，指的是债务融资支出无需额外抽税，也不会对国库造成额外负担，但前提是支出要有‘生产性’，并且能促进经济活动增长。国家出资的公共工程至少原则上可以协助吸收剩余的资本与劳动力，在不额外增加纳税人成本的条件维持充分的就业，以此产生经济增长。”<sup>[1]139</sup>
- ⑦ 1978—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1.5%的惊人速度增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 ⑧ 业主一次性买断70年使用权，原始购买价格因城市日后品质的整体提升而拥有巨大的升值空间。
- ⑨ 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货币与信贷政策的松紧带进行调控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土地进入市场后不同产出方式巨大利润势差的根本问题，仅仅调节了巨额土地增值收益在个别部门或利益集团间（信贷部门、地方财政以及地产开发者）的利益分配。而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羊毛”（出在羊身）救世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更是明显的“生产性支出”行为，彻底破坏了土地市场整体平均利润的形成。

不断上涨，市场平均利润机制又无法运转。在两股合力作用下，市场，失去了对资源极化配置的自我修复能力，像黑洞般不断吞噬向单一生产部门过度集中的生产要素；农田，也因此丧失了任何存在于市场中的理由，身份尴尬，无处安身。

### 3.3 粮食生产不是布尔乔亚的工作——城市企业分工加剧农地极化分异

追逐利润而不顾及稳定的生产秩序破坏了农业（生产）。只要还能从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获得廉价农产品，（政府）就不会下功夫去谋求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世界将因此而分裂成两个部分，一边是机械生产，另一边是食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的大量应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只是更加速了这个过程<sup>[14][178]</sup>。

——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在耕地资源不断流失的同时，在全球化竞争绩效产出的压力与土地经济快速增长的诱惑之下，城市企业化（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的经营分工，进一步加剧了农地的极化与分异。

在全球流动资本的推动下，空间生产通过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不断将前人在漫长时空中孕育的一处又一处城乡有机体分解为没有联系的宗地、空间、个体劳动力；而后再将其重新装配到按效率法则运转的庞大社会生产机器中，使一切无所依附，沦为配件。在这一过程中，为赢取生存、发展空间，被资本分解再生后的城市乃至地区，为追求整体绩效最大化，使其更有竞争力，会自发转变为一个按市场规则运作的庞大企业。城镇群在产业职能与资源配置上不断专业化、车间化，彼此通过有偿服务的形式，建立必要的经济联系；从过去有着独立组织、结构，自给自足的有机功能单元转化为更为庞大生产链条中的一个个产业部门（图5）。

于是，经营者（即政府）在管理“城市”这一区域时空连续经济体时，必然从战略高度对辖区内土地资源进行整体统筹，采取田忌赛马的策略，“优地商用，弃地农用”，把拥有区位优势的土地划配到经济产出相对高效的部门，以最大限度发挥其空间价值。犹如社会分工一般，高经济附加值的土地被转化为资本化的空间，不再承担粮食生产的任务，耕地则被置换到相对偏远的地区。大都市近郊及其周边具有专项产业发展潜

力的中小城镇的耕地因此被笼罩在产业分工的阴影之下，随时面临因土地职能更替和非农产业扩张而被吞噬的威胁。

另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生长受到环境、气候因素影响，农地的生产效率也会呈现地域差异：微观层面，级差地租理论表明即使在小范围地段，土地也存在优劣之分。宏观层面，不同区域农地生产效率不同<sup>①</sup>，同样的生产投入会产生不同的收入回报。因此，在用地稀缺、土地经济附加价值高企的时代，使用者必然会统筹利用有限资源：将低产农地转作其他高回报利用方式，以增加城市经济收益；同时继续挖掘高效耕地的潜力，能地多劳，将粮食生产的“千斤”重担系于优质农田；再通过跨区输调与交易保障各地的基本粮食供应，从宏观上平衡粮食安全。但这样的用地统筹将导致农地质量的极化分布，加剧集中建设区与集中耕种区空间二元分异的格局。

综上所述，城市经营的企业思维使对土地现有利用方式与未来配置的考虑均由其投入产出的实际绩效与预期所决定。发达地区的耕地因此被严重侵蚀；而无区位优势的地区则逐渐在城市竞争中被“优胜劣汰”为保障后勤供给的“粮仓”，封印在农耕时代<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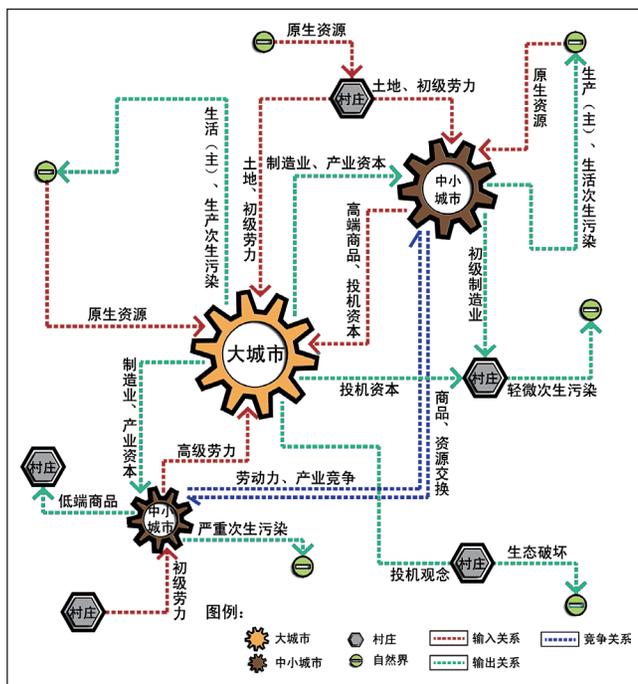


图5 日趋车间化的区域城镇体系格局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① 气候湿润地区，适宜农作物生长，复种指数高；地势平坦地区，作物覆盖率高，有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土壤类型丰富地区，适宜多种作物生长，具有杂粮优势……以河北省为例，相关研究表明，河北省农业用地生产率指数呈明显的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邢台、邯郸、唐山、秦皇岛等市范围内农地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张家口、承德、保定、衡水等市<sup>[15]</sup>。

② 以西安地区1978—2003年间用地变化情况为例，相关研究表明，25年间，沿铁路、国家与省级公路干线，0~2 km、2~4 km及4~6 km三段缓冲区内，耕地及其他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的趋势，随着与主要交通干线距离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距离交通干线2 km与6 km范围内，由于城镇扩展占用的耕地分别占区域耕地总面积的60.24%与89.67%<sup>[9]</sup>。此外，深圳市1988—1994年间，城镇建设蚕食农田的现象随着距交通干线及CBD距离增加而显著下降<sup>[10]</sup>。

## 4 面包之后将是什么——快速城市化阶段需要面对的选择

“面包之后，应是教育。” 丹东 (Georges-Jacques Danton) 的名言似乎预示人类历史始终处于进步之中，社会的明天必然更加美好。但面对物价上涨和就业压力的增加，人们无法判断面包之后会是什么。也许是教育，也许倒退回饥饿。关键要看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作何选择。

### 4.1 是养鸡下蛋，还是杀鸡取卵？——农地流转带来的隐患<sup>①</sup>

如果把我国这样传统农业国的农村发展问题简化为粮食生产，或干脆从城市利益出发，简化为粮食的保障供给问题；(而)忽视农村发展的倾向，则粮食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整个农业和农村的衰落将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sup>[12]183</sup>。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

我国的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化的过程，同时它还意味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转换身份进入城市，在城市中吃，在城市中住，这分别需要农村土地耕种所产出的粮食与转用而获得的空间去支撑。

但农地的总量是有限的，当城市人口的这两项基本生理需求随人口总数增长到对土地承载能力构成巨大挑战的今

天，我们终于意识到（或无法再回避）这个在城市化之初就应该明确的问题：对农村土地的定位。

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迅速开启了两个巨大的市场：商品粮与商品房市场。但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后者的利润空间明显高于前者。如果国家试图通过让农地流转，借助市场力量去提升粮食生产效率<sup>②</sup>和平衡两种土地利用方式间的矛盾<sup>③</sup>，必然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即使有关部门算过这笔帐：我国快速城市化之初，有约 70% 的农村人口<sup>④</sup>，扣除粮食自给部分后，能为市场提供的商品粮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30%<sup>⑤</sup>。即在过去的市场中，我们以占全国粮食生产总产量 30% 的商品粮供给，应对占全国人口总数 30% 的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

而伴随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转换为商品粮消费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会逐渐使传统小农经济向规模化农业生产转变，进而也将大幅提高进入市场的商品粮比例（非商品化的自给量下降）。若两者增长幅度相同，并且粮食总产量仍能保持“30 年来与全国人口并驾齐驱的增长趋势”<sup>[12]191</sup>，那么到我国城市化收关阶段，商品粮消费人口与商品粮“入市”量的各自比例与初期相比虽会反转过来，但两者之间仍能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图 6），从而保证其间粮食价格不会出现大幅波动而影响社会稳定。并且，国家还能通过粮食库存与国际贸易作为丰灾年粮价调节的杠杆，为粮食安全护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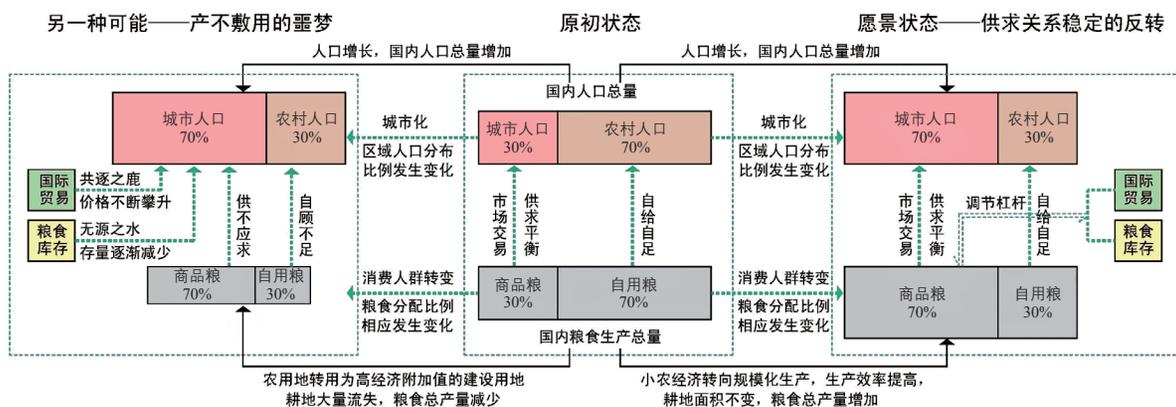


图 6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粮食供应的原初状态、愿景状态以及另一种可能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① 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并不旨在发展农村经济，而是希望通过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挤出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民离土离乡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土地流转仍是从城市利益出发，驱策中国城市化加速和解决城市粮食保障供给问题的一种手段。因为，2006 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行为足以证明：从财富积累的角度而言，政府已经找到了另一条更有效率的渠道。农业，就此成为了数字化时代政府眼中的鸡肋。但终有一天，我们会被鸡肋卡到喉咙。

② 靠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

③ 借助市场选择确定土地利用方式。

④ 我国快速城市化之初，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约为三七开（1987 年我国城市化率为 25.3%，1997 年达到 30.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⑤ 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之初，在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我国粮食总产量中的 70% 基本是小农自给自足，用作商品供应的量自 1984 年以来长期占总量的 30%~35%<sup>[12]246</sup>。

然而，在无常的市场中最忌讳的便是计划思维的一厢情愿。当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流转政策能够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积极配合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格局却在悄然受到威胁。

在市场经济中，谁都期望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经营者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农业生产带来的稳定收益，他们会像赌徒分配手中的筹码一般，将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投入当下利润产出最高的部门：地产<sup>①</sup>。同时，由于市场个体无法在第一时间感知到宏观整体的变化，于是，当各地无数为谋求自身一时一地暴利的“集体”盲人摸象般流转、转用社会主义的农田之时，聚沙成塔的翻田力量便形成了星火燎原的覆地之势。而前述的库存与粮食贸易都只能作为短期调节的手段，由于没有持续产出的供给能力，其不足以维持粮食市场的长期稳定。如果耕地持续减少，等到市场发出信号时，城市必已疾入骨髓，司命所属。唯一的结果，就是粮价大幅上涨，导致新一轮囤积居奇的粮食投机。

因此，让粮食进入市场是没有问题的，但让土地进入市场就有很大的问题；正如让农民进入城市是没有问题的，但让农村存在于城市之中就有很大的问题一样。其实，让粮食还是土地进入市场，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应很容易判断，就好比在养鸡下蛋与杀鸡取卵之间作出选择一样。但这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即：鸡是属于谁的？是属于“集体”这个虚无缥缈的主体，还是属于你、我、他——每个拥有捍卫自身财产权力的具体个人。

## 4.2 是今朝的酒，还是明日的鸩？——生产性支出潜藏的祸根

“生产性支出似乎是永不停止的工作循环，它将沉重的债务负担加诸未来的劳动之上，使大多数人口必须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被迫无休止地工作。不论什么时代或地点，国家机制若是企图以举债的方式填补支出，将土地置于金融市场中，以为如此便能解决劳动与资本过剩的问题，那么终将为此付出代价，（使劳动者）成为狡猾矛盾下的受害者。”<sup>[1]40</sup>

——大卫·哈维

虽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有“为国民提供稳定就业与保持经济增长”这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去发动城市扩张的引擎；但是，哈维的警告同样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如果说，在城市化初期国际环境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别无选择<sup>[16]</sup>，必须让土地进入市场，开启财富快速增值的空间，那么，20年后<sup>②</sup>，当已有一定家底，无需再为外患而忧虑时，我们也是时候冷静下来，面对眼前这第二个选择：通过土地获得资本原始积累后，应如何运用手中既有的巨额财富？是造福社会，返诸于民，还是扩大生产，继续开启空间？这也将是一直伴随日后我国整个城市化进程始终的问题。遗憾的是，政府选择了资本家的习惯，4万亿“羊毛救市计划”<sup>③</sup>给了人民一个用“今朝酒”换取“明日愁”的答案：巨额的生产性支出的确能起到拉动内需、解决大量人口就业的作用，但这一波来势迅猛、快速粗放的空间生产，需要大量的土地配合资本与劳动力的释放。而这种“生产性浪费”消耗的绝不仅仅是劳动力与资源，更重要的是土地<sup>④</sup>。

伴随着持续的耕地流失与人口增长，国家若继续采取此种经济刺激的方式，则将遭遇的不仅是国库没有足够资金完善社会保障、为现代化正名，或即使有足够资金也无足够空间拉动生产、解决就业的尴尬；更严重的是为解决2亿人现在的“吃饭”问题，直接造成15亿人将来真没饭吃的粮食安全的大患<sup>⑤</sup>。届时，“无产阶级在物质与道德上都（将）处于无法忍受的穷困与痛苦。大部分人到最后会发现自己只能在自杀或窃盗之间选择。”<sup>[1]65</sup>

## 5 “存在在你的存在”——人地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5.1 转变从何处开始？——现代性与传统的决裂

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在于它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它将世界视为白板，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sup>[1]</sup>。

——大卫·哈维

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古文明中，土地因承载着人类的生活与生命，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母亲”的尊崇象征<sup>⑥</sup>。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却将这一古人心存敬畏与感恩的对象变

① 尽管国家严令农地流转只能在农业生产范围内进行，但当空间生产的效益足以在支付相关程序违规（甚至违法）操作的成本后仍有高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回报以及土地进入市场后在空间生产条件上的无差别性（即农用地与建设用地，从工程条件而言，用作空间生产并无本质区别），决定了土地一旦进入市场，便很难通过政策规定控制其使用方式。

②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各地纷纷根据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案中“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开始在城市中推行土地制度改革至今。

③ 当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委会议上出台后，2009、2010年我国土地出让金便分别达到了1.59万亿元与2.9万亿元的历史高位（总计近4.5万亿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天意也好，巧合也罢，如此偶合的数据已然暗示人们：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拉动空间生产的投入，必将以往房价上涨的形式以及随之引起的通货膨胀而重新转嫁到市民身上。

④ 中西部尚在沉睡中的万顷农田“荣幸”地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⑤ 虽然政府一直将前者（2亿人：目前农村剩余劳力的数量）视为可能造成动乱，威胁国家安全的最大心腹之患，但如果最后一幕景象真的发生（粮食安全危机爆发），巴黎革命与太平天国运动则将在21世纪中国的城乡同时上演。

⑥ 在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素有天父地母的认知传统；而同样，在西方文明谱系的源头，古希腊诗人墨勒阿格（Meleager）也把大地比作万物之母。

成了能被金钱所买卖和操纵的生产资料，以及释放金融危机的缓冲空间<sup>①</sup>。现代性神话与传统的决裂，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土地的使用和理解，社会的这一转向也终将改变人类的命运。

## 5.2 未来会怎样？——生产机器对人地关系的切割

无情的机器一个接一个地碾碎了 2 500 万农民与 500 万工人，抽取他们最纯净的血液，注入特权阶级的血管中。机器的齿轮，以最惊人的技术组装起来，24 小时不断运作，逼迫农民只能过着仅能维持其卑微生命的生活，所有的愉悦也都成了悲哀。没有人能接近未来的秘密。那些口袋装着未知世界完整地图的人，他们是真正的疯子<sup>[1]65</sup>。

——布朗基 (Louis Auguste Blanqui)

全球化的空间生产为资本主义的延年益寿开启了无限空间。但在新的增长逻辑下，伴随着流动资本不断入侵，即使地球再大，农田也将无处栖身。当所有土地被卷入城市的饕餮之口时，布朗基所看到的这一幕便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所有失去土地的人们将因此而被骗掉一切原生的社会关系<sup>②</sup>，成为资本主义无情生产机器中的一枚零件。

## 5.3 我们能做些什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

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去为之工作，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东西。因为它是唯一永恒的东西<sup>③</sup>。

——《飘》

风筝要风，海豚要海，人存在在地的存在<sup>④</sup>。这是任何权利与资本所无法改变的事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随着全球城市化率无限向高位逼近，现代性的神话终将破灭<sup>⑤</sup>。因此，守护这无处安放的农田，为之而战、为之牺牲，是在空间资本化、资本极化的时代中我们唯一能做、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为了我们的子孙，也为了我们自己。UPI

## 参考文献

- [1]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 李云晋. 试论社会主义农产品中“虚假的社会价值”[J]. 经济问题, 1984 (6): 39-43.

- [3] 赵燕著.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 (1): 16-20.  
[4] 夏芝翠. 试析我国农产品成本构成和价格水平[J]. 价格理论与实践, 1995 (5): 38-40.  
[5] 赵燕著. 房地产: 解释目前经济现象的核心线索[J]. 城市经济, 2004 (4): 14-19.  
[6] 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农业部农业资源区划管理局. 中国农业资源报告[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8.  
[7] 龙花楼, 刘彦随, 唐国平, 陈玉福. 昆山市土地利用变化与新农村建设[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43 (6): 790-796.  
[8] 李蕾, 张平宇, 侯伟. 五十年代以来辽南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及驱动机制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6, 20 (2): 133-138.  
[9] 张海龙, 蒋建军, 解修平, 吴宏安, 张丽. 近 25 年来西安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研究[J]. 资源科学, 2006, 28 (4): 71-77.  
[10] 史培军, 陈晋, 潘耀忠. 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分析[J]. 地理学报, 2000, 55 (2): 151-160.  
[11] 郑海霞, 封志明. 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数量和质量分析[J]. 资源科学, 2003, 25 (5): 33-39.  
[12] 温铁军.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3] 阿瑟·奥沙利文. 城市经济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2.  
[14] 路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15] 高艳霞, 徐东瑞, 马仁会. 基于地统计学的农用地生产效率指数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09 (8): 26-28.  
[16] 赵燕著. 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J]. 城市规划汇刊, 2000 (1): 6-12.

(本文编辑: 孙志涛)

① 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我国通过“生产性支出”扩大空间生产的范围，拉动了内需，解决了就业。这一方式与资本主义世界在 1929 年大萧条时期销毁商品和二战期间通过战争及战后重建来消化过剩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规模与形式不同而已。  
② 事实上，这种切割已经开始，我们与自然、与社会、与家庭以及生长的那片土地的关系都已不再似过去那样紧密而富有情感，但却并没有人因此而感到疼痛。因为欲望的咖啡因使人麻木，因为目前这种集体投机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下一代人的利益。  
③ “Land is the only thing in the world worth working for, worth fighting for, worth dying for. Becaus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lasts.” ——Gone with the Wind.  
④ 是孕育生命和希望的土壤，不是资本化的空间商品。  
⑤ 那将意味着除了蓄意破坏重建，过剩的资本与劳力将再没有释放的空间；同时，全人类也将面临因没有耕地而无法生存的窘境。届时国家唯有回到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启动财富增长与分配的机制。